

回到常识

——剖析经济学中一些“杰出的”谬误

（美）亨利·赫兹里特著

于小庆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回到常识
——剖析经济学中一些“杰出的”谬误

(美) 亨利·赫兹里特 著

于小庆 译

责任编辑：曾赛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4,000 印数：1—1,200

ISBN 7-217-00639-2

F·64 定价：2.90元

湖人：89—5

目 录

代译者序	(1)
新版序	(5)
第一版序	(6)
第一章 常识的一课	(11)
第二章 这一课的应用	(17)
一、打碎的窗子	(17)
二、破坏的恩赐	(19)
三、公共工程就是税收	(25)
四、税收阻碍生产	(32)
五、信贷改变了生产	(35)
六、对机器的诅咒	(44)
七、分散工作的方案	(58)
八、解散军队和官僚	(64)
九、充分就业的迷信	(67)
十、关税保护了谁	(70)
十一、出口的动力	(81)
十二、“平价”	(87)
十三、拯救X产业	(96)

十四、价格机制怎样运行·····	(102)
十五、“稳定”商品·····	(109)
十六、政府制定价格·····	(117)
十七、租金控制作了什么·····	(129)
十八、最低工资法·····	(136)
十九、工会真的提高了工资吗？·····	(143)
二十、“足以买回产品”·····	(156)
二十一、利润的功能·····	(165)
二十二、通货膨胀的幻觉·····	(170)
二十三、对于储蓄的攻击·····	(185)
二十四、重温旧课·····	(201)
第三章 三十年后·····	(213)

代译者序

在如今的中国知识界，人们多少都知道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萨缪尔逊这些名字，知道他们是些曾经深深影响过整个西方经济学思想和现实经济生活的著名经济学家，尽管认真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并不多。对于看不见的手、国家干预经济、追求充分就业、政府控制物价、自由放任、最低工资规定、赤字财政、福利国家、通货膨胀政策等等概念，大家也不觉得陌生。这些概念和经济思想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和政策主张，有时混杂在一起。关心经济问题的人们出自自身的利益，把西方经济理论兼容并创地吸收了进来。然而，究竟怎样认识经济社会中种种看上去纷繁复杂的实际经济问题，形成自己的“经济哲学”呢？也许本书的思路和观点可以为广大中国读者提供一点启发和参考。

本书作者亨利·赫兹里特（Henry Hazlitt）是美国报界元老，著名的经济专栏作家。在二十多岁步入报界之后，他曾先后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晚邮报》、《纽约先驱报》、《太阳报》、《美国信使报》、《纽约时报》、《民族周报》、《自由人》等报刊担任金融问题编辑、主编等职，并曾担任美国著名的三大期刊之一《新闻周刊》的副主编，为其“商业趋势”栏目撰写专栏文章。赫兹里特先后获得了文学、法学和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

事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研究。他的论著很多，主要有《批判的剖析》（1933）、《美元将能挽救世界吗》（1947）、《伟大的思想》（1951，在1966年再版时改为《时光倒流》）、《新经济学的失败：对凯恩斯主义谬误的分析》（1959，1973）、《人与福利国家》（1970）、《征服贫困》（1973）以及《通货膨胀危机与解救危机的方法》（1978）等，其中后者已有了中文版。他还曾编辑出版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论文集。现在介绍的这本书原名《经济学一课》，最初出版于1946年，以后曾多次再版，中文是根据1979年的修订版译出的。

在西方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与传统经济思潮的对立论战中，赫兹里特始终是明确站在传统保守派一边的。他主张恢复全面绝对的经济自由放任纲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制度几乎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体制，而国家则只是应当创造条件保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功用。从这一点上看，赫兹里特的观点是与“最好的政府即管理最少的政府”的传统观点一致的。虽然在具体主张上有些分歧，但总的说来，他一直非常推崇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哈耶克以及货币主义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主张自由经营、私有化、以市场力量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实现高经济效率。

在本书中，作者着重阐述的一个中心论点是，经济科学的艺术就在于，它不仅仅考察了某一法规或政策对于某一特殊集团的短期影响，而是同样探究了其对所有集团在长期内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从这一论点出发，作者指出，无数当代流行的被

认为是“杰出的”经济观点，事实上都违反了常识，仔细想来是谬误的。他认为，政府税收是生产发展的阻碍因素；为了实现所谓充分就业，政府事实上只不过是把三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分给五个人去做了，这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充分就业是一种迷信，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动力；他强烈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关税保护了落后和低效率；他反对制定政策来保护、拯救某一产业，认为应当“允许它们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允许其它的产业产生和发展起来。在这里，赫兹里特以美国农产品的原价政策为例，分析指出在这种政策下，一个产业的发展只不过是以牺牲其它产业的利益为代价得到的；他强烈抨击了政府制定价格、限制租金、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政策，认为工会的斗争事实上妨碍了劳工市场的竞争，破坏了效率。在本书修订版中作者加了“三十年后”一章，指出三十年的时间并没有使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回到常识中来，相反，他们走得更远了。

培根曾有一句格言，即“稍微懂点哲学的人会倾向于无神论，而深究哲理则会使人的思想更接近宗教”。对这样的观点，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然而，“懂得一点点经济学很容易引导人们得出自相矛盾的十分荒谬的结论，而真正理解经济学则会使人的思想重新回到常识”，这一点是赫兹里特深信不疑的。

本书于40年代第一次在美国出版之后，被翻译成八种文字，并陆续重版多次，颇为畅销。推荐译者将此书译成中文的美国教授们认为，它曾使无数美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解了经济学。一部四十多年前由生于上个世纪的作家写成的著作能够在今天

的美国再次修订出版，并为许多人所欢迎，这说明了西方经济思潮的发展趋向和西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本书中同样存在着许多显著的不足和错误。现今的社会并不是作者所描述的那种通过自愿交换组成的自由社会，也不可能成为那样的社会。作者对于初版后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以及政策手段的复杂变化并没有分析，没有看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现实。在对于工会组织、工会斗争的抨击上也显然表现出了其自由原则虚伪的一面。

然而，尽管如此，我认为于小庆同志译出此书，把它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仍然是很有意义的。作者的观点清晰明确，讨论的问题也很接近生活，易为人们所理解。同时，作为报界元老，赫兹里特先生行文流畅生动，文风简洁犀利。因此，确实象哈耶克评价本书时所讲的，它将使聪明的外行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到许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洪君彦

1989年2月于北京大学

新版序

本书的第一版于1946年问世，它被翻译成八种文字，并有许多平装版本。在1961年的一版平装本中，我加入了有关租金控制的新的章节，这一部分在第一版中并没有从总的政府定价中分别出来加以特殊的论述。在1961年的那一版中我还更新了一些统计数字和用作说明例证的参考资料。

除此以外，本书直到目前没有任何改动，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强调总的经济原则，以及忽视它们所得到的惩罚——并不是为了说明任何特别的法规条款所产生的危害。尽管我的说明主要是基于美国的经验，但我所哀叹的这种政府干预已经非常的国际化了，因此对于许多外国读者来说，我这里也是在着重描述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

然而，三十二年时间的推移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现在有必要对此书作一个全面的修订。除使例证和一些统计数据更新到现今的情况外，关于租金控制，我写了完全新的一章。1961年的讨论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充分的。另外，我增加了新的最后一章“三十年后”，以说明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重温旧课。

亨利·赫兹里特

威尔顿·康涅狄格州

1978年6月

第一版序

本书是对经济学中谬误观点的一个分析。这些谬误终于非常之流行，使得它们几乎成了一种新的正统观点。一个阻碍它成为正统观点的因素，是其自身的自我矛盾。这种矛盾将那些接受了同样前提的人们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流派”。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谬误的观点不可能始终是错误的。而一个新的流派与另一个流派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其中一组人比另一组人较早一点地认识到了其错误的前提所推出的结论有多么荒唐，并且在那一刻开始不知不觉地放弃了他们错误的前提，或是在接受由这些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时，比正常逻辑推理的结果更少一些混淆，少一些异想天开。

然而，现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政府的经济政策都由于接受了这些谬误而受到影响，如果它还没有完全被谬误所左右的话。也许，对于经济学最简捷、最确切的理解，就是通过解剖类似的错误、特别是对于它们所根源的一个基本的错误达到的。这就是本书和它那多少有些雄心勃勃和具有挑战色彩的题目的一个设想。

因此，这本书主要是一种说明，并未要求所阐述的任何主要观点要达到某种独创性。更确切地说，这里所作的努力是要说明，许多现在被看作是卓越的创新和发展的观点在事实上不

过是昔日错误的再生。同时，这一努力是“对历史无知的人就必然会重入迷途”这一信条的进一步证明。

我认为，可以不惭愧地把这一论著本身称作是“古典的”、“传统的”和“正统的”，而这些称号无疑又至少是那些这里将要分析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试图否定的。但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真理为目标的学生并不会被这些形容词吓住。他不会永远去追求经济思想的一种革命，一个重新开始。当然，他会象对待那些旧观点一样善于接受新的思想，但是他会很乐意地不再过份强调无休无止的或是好出风头的新奇和独创性。正如莫里斯·R·科恩（Morris R·Cohen）所说的，“如果我们认为可以不必去考虑所有以前的思想家的观点，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会使我们自己的工作被证明为对其他人是有价值的这一希望变得毫无实现的可能。”

由于这是一项阐述性的工作，我自由地并且未作具体说明地利用了其他人的观点（除了少数脚注和引文外）。当一个人在某一个有世界上众多出色的思想家辛勤工作过的领域中写作时，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至少对于三位作者，我的感激是非常特殊的，这使我不能不在这里提及他们。在有关目前提出的这一论断所依赖的阐述框架结构上，我首先要感激弗雷德里克·巴斯蒂亚特（Frederic Bastiat）的论文“看到的与没有看到的”，它距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了。事实上，目前的这一工作可以被看作是巴斯蒂亚特那本小册子中的探讨的一种现代化、延伸和普遍化。我第二位要感激的是菲利浦·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特别是关于工资的一章以及最后归

纳性的一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我要感谢的第三位是路德维希·冯·米斯(Ludwig von Mises)。忽略掉我这个基础水平的论文的每一点要归功于他的整个论著不讲，我从他关于通货膨胀传播方式的阐述中，得到了特殊的启发。

我认为，同给予某种荣誉时相比，在分析谬误观点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及具体的名字。这样做就要求对每一个被批评的作者做到尤其的公正，要有确切的引文、有关于所摘的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原作者所特别强调之处的说明，有原作者所给定的限制条件、其个人的模棱两可的话和不一致之处，等等。因此，我希望没有人会因为这一本书中未提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桑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大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以及其他人的名字而太失望。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指出个别作者的某些特定的错误，而是旨在指出那些以最常见的、传播最广或是最有影响的形式出现的经济学的错误。当谬误达到某种流行的程度时，无论如何，它就会变得无名无姓了。在对这种传播最负有责任的作者中可以发现的微妙或模糊之处也就被洗刷得不复存在了。一种学说变得简单化，那些可能会被掩盖在一系列限制条件、意义不明确或是数学等式的系统中的似是而非的观点，现在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因此，我希望我不要因为这样的理由被指责为不公正；即我以某种形式所说明的一个流行的学说，并不是凯恩斯或其他某位作者当时所系统阐述的学说。我们在这思所感兴趣的，是政治上颇有

影响的集团所坚持的以及那些政府依此来行动的信条，而并不是那些信条的历史渊源。

最后，我希望读者可以原谅我在以后的论述中很少使用统计资料。在论及关税的影响、价格制定、通货膨胀以及对于诸如煤、橡胶和棉花等商品的控制时使用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将会使本书的范围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非常清楚地懂得，这些统计数字会很快过时并被新的数字所代替。我建议那些对具体经济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阅读一些关于这些问题当前的、“现实的”讨论，这种讨论提供有统计文件。他们会发现，根据他们所学到的原理去正确地解释那些统计数字并不困难。

在写作此书时，我已努力使它在始终保持着合理的精确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单，并尽量少用专业术语。因此，一位先前没有经济学知识的读者是完全可以理解这本书的。

在这本书被当作一个整体出现之前，其中三章已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过。在此我想感谢《纽约时报》、《美国学者》和《新领导者》允许重印那些原在他们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我很感谢冯·米斯教授阅读了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当然，对于在此所表述的观点，我负有完全的责任。

亨利·赫兹里特

纽约

1946年5月25日



第一章 常识的一课

(一)

与人们所熟悉的许多研究领域相比，经济学总是被更多的谬误所缠绕着，这并不是偶然的。无论如何，这一课题内在的困难都是相当大的，而又因为一个在诸如物理学、数学或医学等学科中并不重要的因素——对于私人利益的辩护，经济学被无数倍地复杂化了。虽然每一个集团都有与所有其它集团相一致的经济利益，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每一个集团也同样具有与所有其它集团相悖的利益；虽然某些公共政策在长期中可能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但另一些政策却会以所有其它集团的利益为代价而仅仅有益于某一集团。正因为有这样直接的好处，由此获益的集团将会能言善辩、坚持不懈地强烈主张这一政策。它将以最能推销得出去的思想、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证明这一点上。最终，它将使得全体公众确信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或者使得该观点非常迷人，以致于对此问题的清醒认识会随之而变得几乎不可能成立了。

除去这些无数的对私人利益的辩护，有一个其次重要的因

素每天都在制造着谬误。它是人们长期坚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即仅仅观察某一政策的即期效果，或是它对于某一特殊集团的作用，而未能认识到这一政策在长期内的效果将不仅仅表现在某一特殊集团而同样会表现在所有集团上这一点。这是一个忽视次级后果的错误。

好的经济学与坏的经济学之间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拙劣的经济学家仅仅看到那些立即能捕捉到的现象，而出色的经济学家则能看到它们以外的东西；拙劣的经济学家只能看到一项建议方案的直接后果，而出色的经济学家则能够认识到其更长时期内的间接效应；拙劣的经济学家仅仅注重某一给定政策已经或是即将对于某一特定集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出色的经济学家却能够同样了解该政策对于所有集团将意味着什么。

区别似乎是很显然的。应当注重某一给定政策为每一个人带来的所有后果，这样的警告似乎是常识性的。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难道他不懂得有各种各样的嗜好在一时是那么令人愉快而最终却是灾难？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懂得，如果糖吃得太多了他会不舒服吗？难道喝醉的家伙不知道第二天早晨起来时他的肠胃和脑袋会疼得要命？不是每一个嗜酒狂都明白他在毁坏自己的肺脏、缩短自己的寿命吗？难道唐·胡安不懂他在使自己面临从敲诈到疾病的各种危险吗？最后，让我们使问题集中于经济思想并停留在个人生活的范围内，那么，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和挥霍浪费的人，即使在他们愉快的放纵中不也同样懂得他们面临着的是负债和贫穷的未来吗？

然而，当我们进入公共经济学的领域时，这些起码的真理

也被忘却了。一些当今被誉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人们抵毁储蓄，他们把国家规模的浪费推崇为拯救经济的途径。当有人指出这些政策在长期内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们就象浪荡公子面对警告他们的父亲似的能说会道地回答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这样肤浅的俏皮话一直被作为压倒一切的警句和最成熟的智慧而流传了下来。

但是不幸的是，与此相反，我们已经尝到了很远的或是不久之前的类似政策给我们造成的长期影响的苦头。今天就是那些拙劣的经济学家们昨天所强烈要求我们忽略的明天。某些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可能在几个月后就很明显了，其它的也许要过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无论如何，长期的后果存在于这一政策之中，就象鸡之存在于鸡蛋里、花之存在于种子中一样毋庸置疑。

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全部经济学可以被归纳于常识的一课之中，而此一课又可以被压缩为一句话，即：经济学的艺术，在于它不仅仅考察任何法案或政策的即期效果，面应同样认识其长期影响；在于它不仅仅探究该政策为某一集团带来的后果，面应同样分析它对于所有集团意味着什么。

(二)

在给现今世界带来可怕的危害的经济谬误中，十分之九是忽视这常识的一课的结果。那些谬误全部根源于两个中心错误之一，或者二者兼有，即只分析一项法案或建议的即期后果，